2015第八回台日原住民族研究論壇
日台原住民族研究フォーラム
8th Taiwan-Japan Forum on Aboriginal Studies

# 太魯閣族抗日戰爭史學術研討會

Endaan tmgjiyai Truku ni Nihung

タロコ族対日戦争史(タロコ戦役)シンポジウム
Conference on History of the Truku-Japan War

## 論文發表 第7場次

帖喇・尤道

從「威里事件」來探討日本的「東方主義」及對台政策的影響

(會議論文未經作者同意不得轉載引用)

# 從「威里事件」來探討日本的「東方主義」及對台政策的影響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太魯閣族自治推動委員會 主任委員

【摘要】

太魯閣族對日戰役是一場「傳統價值」與「統治權」之爭，太魯閣族的傳統生命價值，人與大自然之間是建立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上，深信男子勇敢用生命守護土地，女子善於織布者，死後將來才能跟祖先相遇；日本當代對台灣原住民族所建構「遠東的東方主義」的論述，只想透過政治與經濟來確立「統治權」，而不能理解太魯閣族的傳統信仰，無法做理性的「價值判斷」，因此不能有效治理原住民族，而釀成威里事件。日本統治台灣初期，為使台灣獲得財政自立，乃積極開發天然資源，台灣當時是世界稀有的天然樟腦分布地區，樟腦可用於醫療，亦可作為軍需化學工業原料，因此積極獎勵開採樟腦。

「威里事件」是因日本在族人的傳統領域上採樟與族人衝突，其中遭獵頭的日本人「井上彌之助」，其子伊之助聞訊時，他心中非常悲憤，激動地表示，一定要去台灣為父親「報仇」！然而他最後改變心意，決心實踐聖經的教訓「以愛報仇」，在台灣對原住民族行醫傳福音三十多年。惟日本當局對台灣原住民族，始終維持著殖民者與受殖者之間的關係，一種穩固的涇渭分明、絕對之階層差別。

Truku Battle was not only a war to against Japanese colonization, but it was also a war to protect traditional values among Truku people from destroying by foreign intruders. Truku people’s value of life is built upon relational worldview, which believes that humans are not separate from nature and the supernatural. In Truku people’s traditional belief, men have to bravely protect their traditional lands, and women have to be skilled at weaving so that their spirits can be reunited with their ancestors in the afterlife. During Japanese colonial era, similar to the concepts of Orientalism, Japanese government only focuses on how to expand their ruling power through politics and economics without truly trying to understand and respect Truku people’s traditions and cultures. Since Japanese government did not treat indigenous peoples properly and was incapable of governing indigenous peoples effectively, indigenous peoples initiated several events against Japanese colonial government, including Wili Event.

# 日本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対台政策の影響ー威里事件の観点から

帖喇・尤道　Teyra Yudaw

タロコ族自治推進委員会 主任委員

【要旨】

タロコ族の対日戦役は「伝統価値」と「統治権」の争いだった。タロコ族の伝統生命の価値は、人と自然の間の「間主観性（相互主観性）」の基礎の上に成り立ち、男は勇敢に命でもって土地を守り、女は機を織り、死後に祖先と再会すると信じられている。日本が台湾原住民に対して構築した「極東の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の理論は、政治と経済によって「統治権」を確立を目指すだけで、タロコ族の伝統信仰を理解することができず、理性的な「価値判断」ができなかった。このために日本は友好的な原住民統治ができず、威里事件を引き起こした。

日本は統治時代初期、台湾財政独立のため、積極的に天然資源の開発を行った。世界的に希少な天然の樟脳が分布していたこともあり、医療や軍需化学工業の原料として、積極的な樟脳の採取を奨励していた。「威里事件」は日本がタロコ族の伝統領域で樟脳を採取したためにタロコ族と衝突した事件である。殺害された井上弥之助の息子、伊之助は父親が殺害された情報を聞きつけ憤慨し、台湾に向かい「報復」することを決めたが、最終的に聖書の教えに則り、「愛の報復」で台湾原住民に対し 30 年間にわたって医療と宣教を施した。一方、日本当局は台湾原住民に対して終始植民者と被植民者としての関係を貫き、絶対的な階級差別を実施した。

（和訳：齊藤啟介）

## 壹、前言

太魯閣族人與土地的關係是建立在「土地是血（視如生命），山林是家」的基礎上。族人深信男子必須要勇敢的用生命守護土地，女子善於織布者，死後才能成為善靈，將來才能跟祖先相遇，否則成為惡靈，靈魂就會從橋上掉下來，會被橋下的大螃蟹吃掉。

日本據台之初，為使台灣獲得財政自立，覬覦於太魯閣族傳統領域的森林資源，乃積極獎勵開採樟腦，太魯閣族人面對日本有計劃的引進企業財團進駐，視為觸犯了我們的 gaya〈傳統慣習〉，引起「威里事件」的發生。日本以「討伐」之名，對太魯閣族採取有計畫的軍事行動，這是日本對台灣原住民族所建構的「東方主義」。在現代化的過程中，日本權力集團可以利用「日本特性」這樣的東方主義論述，作為動員群眾的重要手段，將國家利益極大化，並限制個人意志，個體在一個「想像的共同體」認同中盡忠盡孝。[1]

太魯閣族的傳統價值：人與大自然是建立在「互為主體」的關係上，在信仰上深信「守護土地」是捍衛民族尊嚴，並且是跟祖先相遇的記號；日本則以統治權的確立，成為日本殖民者來台之後，首要的急務。對太魯閣族而言，太魯閣族的抗日，非僅是武力對抗，而是價值之爭，因此日本光靠「統治權」是不能深入而有效治理原住民族的，還應要搭配理性的「價值判斷」。[2]

人類社會的大演化，原本各自隔絕活著，因為帝國主義對外發展或全球化結果，經由交通、網路等開始接觸，人類集體性決策，開始組成一個完整的大社會，發展適合全部人的新的群體規範，而這個過程相當困難。人們應努力證明的是，在某些文化情結中，沒有意義的習慣可能支配著每個人。因為，並沒有一個共同標準足以評斷任何信仰體系，更談不上可因此對某個體系加以譴責；除非認為其中一個信仰代表了普世價值，而且可以成為舉世所依。但，我們基於什麼理由可以如此認為?[3]

若理性主義與神秘主義皆不過是一種社會迷信，光抬出文化相對論也不足以阻隔文化之間的模仿、交流、與學習，因為文化就像天上的雲朵，形狀會變化，隨氣候光線而改變顏色。這個世界未必終會趨於一致，我們要準備的反而是如何有所差異地活著。[4] 人類的演化並非走向單調化，而是強調差異，甚至於創造出新的差異，從而再樹立多元性的主宰。[5]

---

[1] 張興成「跨文化實踐中的東方主義話語」，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2 年 6 月號總第七十一期，頁 65。

[2]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Said) 104.1 二版【東方主義 ORIENTALISM】，頁 80。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3] 克勞德.李維史陀(Claude Levl-Strauss)2014.11【我們都是食人族】，頁 83。廖惠瑛譯，台北市:行人文化實驗室

[4] 胡晴舫 2015.1.25「家裡的食人族」收於蘋果日報。

[5] 同註 3，頁 216。

1905 年，日治時期的台灣實施首次戶口普查。就全台將近三百萬人口中，台灣原住民佔有七餘萬人。這裡面，高度漢化的平埔族佔台灣全部人口的百分之 1.53%（4 萬 6 千餘人），高山族則約為 3.62%（11 萬 3 千餘人）。而理蕃政策對象，一般來說，則單指後者，非平埔族的十一萬餘人的原住民。因為日本政府對於的理蕃政策定義為「未曾有過，及無任何系統的經驗與文化」的民族政策，因此比其他的台灣政策更為慎重與深入。[6]

日本治台時期從「以綏撫為主」的政策，轉變成「討撫並用」的政策，「威里事件」發生後則改為「先討伐後撫育」的政策。因此，1910 年~1914 年的「五年理蕃計劃」主要工作目標，就在於徹底使原住民繳械，完全解除其武裝[7]，更為往後最大規模的「太魯閣族對日戰役」〈以下簡稱：太魯閣戰役〉埋下引線。

## 貳、 威里事件的背景

### 一、「威里」名稱釋義

威里〈太魯閣族語:Wili〉原為太魯閣族傳統聚落的名稱，位於現之佳山軍用基地。早期這地方有溪水流過，水裡有很多水蛭，族人稱水蛭為 Wili，故名之。1906 年（明治 39 年），此地發生震驚日本當局之「威里事件」，起因為日本在此地區開設樟事業，製造樟腦油發展經濟，利用當地的太魯閣族人當工人，族人因不滿日本人剝削勞力及工資發放問題，趁日本花蓮支廳長大山十郎，到此地巡視樟腦工廠時，將大山十郎及其隨行 25 人殺掉，日本於 1937 年將此地方改名為「大山」以示紀念。

國民政府來台以後，於 1953 年設佳民村，轄有現之「佳民」與「大山」兩個聚落，後來因為大山聚落，變更為軍用基地，被國民政府徵收後，大山聚落的居民被分散安置到佳民村內的第一鄰〈山廣附近〉及第八鄰〈位於須美基溪下游左側，俗稱小金門〉。1970 年代末，隨著美國宣布與台灣“斷交”，蔣經國責令台軍盡快制訂出“保衛台灣”的防務計劃。 台“國防部”最後決定以“深鑽地洞”的方式，主體設想是將台灣中央山脈的東部掏空，將台灣絕大部分的先進作戰飛機藏於山洞，以躲避台灣所受到的第一輪攻擊，保存作戰實力，以中央山脈高山做為屏障，乃選擇大山聚落此一地點，採背山面海鑽山洞的方式，構築最佳的地堡，以保存戰力。1980 年代開始，台空軍正式實施名為“建安三號”的戰機鑽地計劃，第一個地下機庫工程 1984 年動工，1992 年完成，位於花蓮縣新城鄉的佳林村、秀林鄉的大山聚落，工程設計者取兩村各一字而稱之為“佳山基地”。[8]

---

[6] 陳紹馨 1979【台灣的人口變遷與社會變遷】，頁 96-98。台北：聯經出版。
[7] 李季順 2003.12 【走過彩虹】頁 24。台北市：日盛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
[8] 環球時報 2001.1.19 第五版。

## 二、殖民者對台灣的經營

1895 年，清朝與日本之間訂立馬關條約，清朝割讓台灣給日本，在國際法上而言，台灣已經成為日本的占有地，成為日本海外的第一個殖民地，由於占領台灣，日本進入了殖民帝國主義的階段。但是占有一個新的領土，僅是條約上的公認，並不能成為實質上有效的控制，新獲取一塊領地，要能有效控制，大多經過訴諸政治軍事力量的過程，建立起新的秩序，維護社會安寧，贏取多數人的支持。然而日本沒有殖民的經驗，對於這塊新獲得領地，戰戰兢兢，惟恐處置不當，被外國人譏笑，所以一直想以台灣經營成功，來證實它並不亞於西歐先進國家，因此統治權的確立，成為日本殖民者來台之後，首要的急務。

1895 至 1905 年是奠立日本統治台灣的基礎時期，也使台灣獲得財政自立，不再依靠日本的財政補助。日治初期的四任總督，由於忙於鎮壓台灣抗日力量，或是任期太短，無法真正建立制度。至第四任總督兒玉和民政長官後藤來台後，才開始一連串的改革，成為日後統治台灣的基礎。

殖民地就是為了母國服務，台灣也不例外，日本統治台灣雖然立下很多規模和建設，却是為了日本國家發展的利益，雖然如此由日本引進的思潮和制度却深遠影響台灣。[9]

## 三、威里事件的前因

〈一〉採樟事業深入太魯閣族生活空間

清末，在劉銘傳的經營下，樟腦、茶、糖同列為台灣出口大宗。台灣是當時世界稀有的天然樟腦分布地區，由於樟腦可用於醫療，亦可作為軍需化學工業原料，是高經濟物質，日本治台後積極獎勵開採樟腦，引進企業財團進駐，台灣成為世界最重要的樟腦出口區，有「樟腦王國」之稱。

1895 年，台灣邁入日治時期，除了面對漢人為主的清國遺民外，還需要面對南島語系的台灣原住民。19 世紀末，一般日人與漢人均以「蕃」字稱呼台灣原住民，意謂「蠻荒未開化」。而所謂「理蕃」或「治蕃」則通指台灣總督府的原住民事務，而該事務的基礎則是由兒玉源太郎與佐久間左馬太兩位總督所打下。

若詳加以年代分析，1895 年－1902 年間，理蕃政策是消極的綏撫，之後才是真正的積極治理。會在日治初期採取放任態度，原因之一在日方對台灣原住民的不了解與防止其數十萬台灣原民與漢民的反日結盟。

1902 年，賽夏族發生南庄事件。起因為採集樟腦衝突的該事件，暴露出台

[9] 張炎憲 「日據時代初期日本對台灣的經營」〈1895~1905〉。

灣總督府於開採台灣山地資源同時，不能忽略台灣原住民的反應。也就是：用鐵絲製成的四百公里長隘勇線圈住原住民區域且無視蕃人的圍堵做法，已經遭到反彈。

造成數十人死亡的南庄反日事件發生後，台灣總督府參事官持地六三郎於事件調查後，於同年 12 月提出「關於蕃政問題意見書」。該意見書為日本制定所謂「理蕃政策」提出明確的方針，也就是台灣總督府在台灣原住民事務上，要以追求經濟利益為最優先的前提，並在該政策上要較其他對台政策上，更徹底地運用帝國主義的高壓殖民地統治。持地六三郎在其意見書的引言當中，表明他對此政策的基本立場說：

> 「這裡只談蕃地問題，因為在日本帝國主權的眼中，只見蕃地而不見蕃人。蕃地問題，必須從經濟上的觀點好好地解決，而其經營必須要有財政上的方針。大概國家的各種問題，最後沒有不歸結到經濟上的財政問題。至於殖民地的經營，更特別需求從經濟上、財政上的觀點，來解決各種問題。」

持地六三郎發表的此政策，即為當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所制定「理蕃大綱」的最高綱領。此種以經濟利益為主的理論不但馬上被兒玉總督應用執行，繼任的佐久間左馬太總督更以兩次的五年理蕃計畫來徹底執行。而兩任總督的理蕃政策，共通點在於是把台灣原住民政策與攫取台灣山林資源畫上等號。除為了資源不惜用武力討伐外，同時施予台灣原住民族群的教育、現代化硬體改善，則被日本政府認為是為了獲得資源而必須的代價與付出。而事實上，1907 年－1914 年的兩次「五年理蕃計畫」完全以鎮壓討伐為主，威嚇懷柔為輔，而該計劃實際執行者佐久間總督更不惜使用武力來徹底實行此計畫。

依照當時臺灣第一任民政局長水野遵在明治 28 年（1895）向總督樺山資紀提出殖民地的執政方針報告表示，可以大致歸類有關的山區開發政策包括：「日本移民」、「番民教育」、「樟腦事業」、「山林原野」等，而這樣的實施政策，初期的原因主要是以經濟立意和保護日本內地人為前提。

在台灣東部1896年發生新城事件，後因太魯閣族人歸順，1900(明治33年) ，台東廳長相良長綱巡視古魯社(目前亞洲水泥廠靠山邊一帶) ，得其黎社(崇德)九苑社，並簽訂和約後,情勢才逐漸緩和，這是日本人勢力二次進入太魯閣族生活領域，雙方約訂以遮埔頭(現今康樂村)為番界,日人與平地原住民不可以擅自進入番界，日人在古魯社設有國語傳習所，賀田組也在古魯設置槍砲火藥店，此一懷柔的政策使的太魯閣保有七年短暫的和平，1905 賀田組開始於古魯社山區經營製腦業，次年 1906 製腦的範圍延伸到威里社(今佳民村一帶)。[10]

〈二〉日本對台灣「東方主義」下的原住民族

[10] 藤井志津枝 1997.5【理蕃-日本統治台灣的計策】。台北：文英出版社。

在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之前，族人的生活空間，處在殖民及帝國統治的邊陲地帶，生存空間在行政勢力所不及的處境之下，仍維持著半獨立自主的狀態。台灣從十七世紀以來到二十世紀中葉，歷經歐洲荷蘭人統治，又經兩次的漢化(鄭氏政權與滿清政權)，及兩個帝國的統治(滿清帝國與日本帝國)。一九一四年以前異族統治權並未實際伸入太魯閣族人生活領域，族人過著傳統的以「社」為基礎的祭祀團體、血族團體、狩獵團體的生活，甚至組成部落聯盟。

日本於 1895 年 5 月入主台灣以來，雖已統治台灣，對於居住在太魯閣峽谷地區的族人，1914 年 6 月前仍未有效行使其統治權，該區還不時發生衝突，如 1896 年的「新城事件」及 1906 年的「威里事件」。因此，日本人為有效統治，乃進行一場有計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威里事件」對太魯閣族人而言，這是為捍衛民族尊嚴、守護土地的一場「信仰價值與殖民統治」之爭。

日本以「討伐」之名，對太魯閣族採取軍事行動，正如薩伊德所說的「東方主義」主要是指一套西方人所建構的關於東方的認知與話語系統。薩伊德指出在東方主義這套話語系統中，東方被置於西方文化的權力話語之下，成為被批判、被研究、被描寫的對象。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對於太魯閣族人為了「走過彩虹」，並實現自我價值的傳統信仰，在日本的「東方主義」的話語-權力網絡中被「他者」化了，成為落後原始、荒誕無稽，而日本則是理性、進步、科學、文明的象徵。「每個人都將不符合自己習慣的事稱為野蠻」。[11]殖民主義不僅只滿足於將一個民族牢牢掌控住，且將土著腦中的所有形式和內容全然掏空。經由一種曲解的邏輯，它轉向民族的過去，扭曲、變形和摧毀之。[12]

日本人確實是一個好於自我定義的民族，在這自我定義的漫長歲月裡，日本一直透過他族來對照自己、找尋自己。從明治維新把日本推向近代國家開始，日本便把這個他族設定在所謂的西方人。可以說，日本人在自我定義的百年時光裡，只有比日本人更高級、更上層、更值得模仿的西方人才足以列入《日本人論》的論戰之中。雖然，亞洲在日本人論當中缺席，不過眾所周知地，當日本人在談論「日本 v.s.亞洲」的關係時，日本式的東方主義(orientalism)總是無所不在。福澤諭吉主張日本必須脫離疲憊、停滯、落後、愚癡的亞洲，進入科學、文明、進步、近代的歐洲，脫亞入歐成為明治維新之後，近代日本躋身強國之林最重要的意識型態，這種對亞洲東方主義式的偏見也束縛了日本對亞洲「其他可能」的認識。譬如，文學家谷崎潤一郎或夏目漱石都曾在二十世紀初去過中國，也曾露骨地表達他們在文化上及種族上對中國的歧視。不幸的是，這種歧視似乎沒有褪色，近年來，日本仍以優越的姿態看待台灣，仍帶著有色的眼神去鄙視發展中的亞洲國家。[13]

---

[11] 同註 3，頁 140。

[12] 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Said) 90.1【文化與帝國主義 Culture and Imperialism】，頁 439~440。新北市: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3] 南博 2003. 11 .5 【日本人論----從明治維新到現代】。新北市: 立緒出版社

〈三〉威里事件是太魯閣戰役的導火線

日本統治台灣時，第一任總督是 樺山 資紀（1895 年 5 月~1896 年 6 月），他於 1895 年 8 月 25 日，訓示部屬對台灣原住民「以綏撫為主，以期收效於他日」，因此，這時期的指導原則是：「欲開發台灣島，必須先令原住民馴服」。經由教導原住民從事農耕及養蠶等事業之推展，擺脫狩獵的經濟生活，進而降低其尚武之風，以便於日本人之統治。

第二任總督 桂 太郎（1896 年 6 月~10 月）及第三任總督 乃木 希典（1896 年 10 月~1898 年 2 月），均沿襲此原則。第四任總督 兒玉 源太郎（1898 年 2 月~1906 年 4 月），則採用當時總督府參事官，也是山地行政顧問的 持地六三郎的建議，他於 1902 年提出的從「經濟主義」的觀點，採取「討撫並用」的政策，然而此政策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尤其在太魯閣族群方面，更是徹底失敗。

第五任總督 佐久間 左馬太（1906 年 4 月~1915 年 5 月），鑑於「威里事件」發生，討撫並用的山地政策失敗，其因在於原住民一直擁有武力，於是改為先「討伐」、後「撫育」的政策，1910 年~1914 年的「五年計劃」主要工作目標，就在於徹底使原住民繳械，完全解除其武裝，在多重壓迫下，太魯閣族人再次團結發動第二次對日抗戰，史稱「威里事件」，更為往後最大規模的「太魯閣族對日戰役」埋下引線，因此威里事件是太魯閣戰役的導火線。

## 參、威里事件的經過

### 一、外太魯閣地區各社間的社會與處境

威里事件爆發前外太魯閣地區各社間社會的關聯性以及對日本的關係處於緊張與一觸即發的處境。日本占領台灣除了基於國防的考量外，主要的還是基於經濟上企圖，尤其是山區的製腦業，台灣東部地區，則由賀田組所獨占，他們在外太魯閣地區的採樟活動，是以外太魯閣族就撫為前提。尤其是外太魯閣地區的「古魯社」是最早向日本政府表示歸順的，「因而設有綏撫化育的警察官吏派出所及公學校」，且有賀田組為防止內太魯閣族的侵害，而與外太魯閣族約定，對擔任警備之七社壯丁發給津貼，但是因為津貼發給問題，使壯丁們認為耆老不公，而怨恨日本人。從津貼這件事來看，反映當日本人確實是相對地信任威里社，但因該社耆老私底下給自己的親族，而使各社人感到「差別待遇」，轉而怨恨日本人。從這裡可以看出因違背了族人所重視的傳統價值觀「分享」，而引起了各社間的社會緊張關係。

日本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為了保護日本人的安全，決定廢止腦寮搬出威里社地帶的日本人，並出面要求賀田組暫時退出，緊張關係已達到一觸即發的地步，大山十郎「帶數台牛車抵達，準備載運腦丁退出」。但是當時的製腦事務所主任和部份腦丁們反對，其理由是擔心「停止製腦時，其

他社族人會利用此地區甚多道路攻擊威里社人。」意即，當外太魯閣社之怒意已無法控制的情勢下，威里社人將成為另外六社發洩怒氣的對象，因此亟需日本軍警的支持，以維持社內的安全；然而日本人却為了自己的安全，而陸續退出當地。因此威里社人為了自身的安全而巧妙地發動對日本人的攻擊，以轉移外太魯閣諸社人的怒氣，才是該事件最核心的因素。[14]

## 二、事件的經過

隨著撫番的工作成效，日本政府在明治 37 年（1904）9 月，正式派駐公醫於太魯閣地區，明治 38 年（1905）3 月則改古魯國語傳習所為蕃人公學校。看起來，太魯閣族人已經接受了日本人，也不再發生類似「新城事件」的衝突，但是隨著日人進駐太魯閣地區人數增長，尤其商人賀田組的採樟事業不斷擴大，太魯閣族的生存領域漸遭入侵，雙方的關係再度陷入緊張。

由於賀田組與已歸順的太魯閣族有過約定，由七社歸順之外太魯閣族擔任腦寮警備工作，以防內太魯閣族的侵擾，賀田組則會定時發放工作津貼。但是在明治 39 年（1906）6 月，因該津貼發給問題，使擔任警備工作之壯丁們認為部落耆老不公而怨恨日人。就在威里社持續增高的危機之下，威里社和西拉罕社發生爭執，終於演變成西拉罕社人殺害兩名日本人腦丁之事，進而演變成擢其力社開槍、西拉罕社馘首等日益激烈的手段。就在當地的最高行政長官花蓮港支廳長大山十郎，為要保護日人安全，決定廢除腦寮、撤出威里社地區，並要求賀田組暫時退出太魯閣地區時，爆發殺人事件。

明治 39 年（1906）7 月 31 日，發生太魯閣群殺害日本人的事件，這起殺人事件主因，起於太魯閣人認為製腦業者發給警備津貼有不公平情事，憤而殺死花蓮支長及廳製腦員工計 25 人。日方除對此事的主謀者採取臨機處刑外，對於其他參加滋事的「古魯社」社人，則酌量輕懲了事。此舉與往日日人的作風大相逕庭。由於此事發生在太魯閣群九宛之一小社「威里社」，所以稱為「威里社事件」。

「威里事件」因日方異常低調的處理，太魯閣族的氣焰更盛，屢屢襲擊平地住民。被侵犯的包括了加禮宛社、十六股庄及歸化社等地，太魯閣族的入侵，使得平地各社人心惶惶。為平撫平地住民情緒、保護其生命財產安全，日人在明治 40 年（1907）5 月 16 日動工施設南至沙巴督溪（今娑婆噹溪）右岸，北至遮埔頭（今北埔）海岸間足以封鎮該族交通之威里隘勇線（又稱北埔隘勇線）。希望藉「威里隘勇線」，暫時封鎖住太魯閣族的抵抗。隘勇線設置完成後，日方於 1907 年 7 月調派海軍南清艦隊「浪速」、「秋津」兩艦從海上砲擊太魯閣族近海之部落，而陸上也配合台東廳警察官吏所組成之搜索討伐隊，臨機攻擊明治 39 年滋事的主謀威里等社人。明治 41 年（1908）5 月，日方又開始設置南起木瓜群住地新

[14] 李宜憲 2011.1 國立政治大學博士論文《東台灣日本統治體制的建立與原住民的民族發展》，頁 36~37。指導教授：林修澈。

設達莫南（今文蘭）警察官吏駐在所，溯木瓜溪至牟義路（今榕樹）之隘勇線，此稱「巴托蘭隘勇線」，總計招募隘勇共 80 人，進行守衛防備太魯閣群南下遷移之工作。迫使太魯閣人相繼南遷轉進山區生活，生活從此受到隘勇線的封鎖限制。[15]

當年的戰場主要發生在今秀林鄉佳民村附近，根據專家研究結果資料顯示，在民國八十五年左右，佳民村中央山脈側山路小溪流邊，還可以看見當年日本人所建築高約二點五公尺，下為方型墩作，越向上約成尖塔狀的結構物，做為祭拜或紀念碑，然八十五年後遭破壞而淹沒在現之佳民橋南端右側草叢中。

根據現在居住在佳民村第八鄰須美基溪下游左側Wili威里部落的耆老Papux〈民國 23 年生〉描述，她說：早期 Wili 這地方有溪水流過，水裡有很多水蛭，族人稱水蛭為 Wili，故名之。

「威里事件」發生時，日本花蓮支廳長「大山十郎」及其隨行 25 人遭族人殺掉，日本於 1937 年將此地方改名為「大山」以示紀念。國民政府來台以後，於 1953 年設佳民村，轄有現之「佳民」與「大山」兩個聚落，不久以前該區變更為軍事基地，被國民政府徵收後，將大山聚落與鄰近新城鄉的佳林村合併簡稱為「佳山基地」，佳山居民被分散安置到佳民村內、佳民村的第一鄰〈山廣附近〉及第八鄰〈位於須美基溪下游左側，俗稱小金門〉。

後來由於須美基溪下游每遇颱風或豪雨時常有土石流發生，生命財產容易受到威脅，因此原居住在第八鄰的部分族人遷移到對面不遠的新城鄉康樂村〈現之康樂一街 121 號至 141 號〉。

威里 Wili 的頭目叫 Pisaw Pawan，他是 Doras 部落的人，Wili 事件發生時，他是 Doras 部落到 Wili 部落這地區的總頭目。

## 肆、殖民統治下人文主義解放的渴望

### 一、文化衝突中人文主義的啟蒙

1906 年威里事件爆發，象徵日本當局對太魯閣人的招撫政策全然失敗，日方改採壓迫與招撫並用的方針。壓迫方式包括設置隘勇線實施經濟封鎖、武力攻擊等。次年 5 月 31 日，日本當局完成威里隘勇線設置。隨後，徵調南清艦隊中的浪速、秋津洲兩軍艦，預計砲擊包括外太魯閣地區總頭目哈鹿閣納威住處在內(日本以現之天祥為界以東為外太魯閣地區，以西為內太魯閣地區)，及威里事件相關頭目的居住地。其後，日本當局陸續構築自威里向北、向南延伸的隘勇線，逐漸將太魯閣族封鎖在山裡。1911 年，哈鹿閣納威曾率領 54 名社眾至威里隘勇線海岸分遣所要求交換物品，遭到拒絕。日人經濟封鎖策略達到初步成效。1913

[15] 露尼 2004.12.17 撰文「賀田組採樟爆發的威里事件」，載於【台灣立報】文化視野版

年起，日本當局著手計畫對太魯閣族的武力討伐工作，日本與太魯閣族人間的關係進入劍拔弩張的緊張氣氛。[16]

同時在「威里事件」中遭族人獵頭的日本人「井上彌之助」，其子伊之助聞訊時，他心中非常悲憤，激動地表示，一定要去台灣為父親「報仇」！然而他最後改變心意，決心實踐聖經的教訓，在台灣對原住民族行醫傳福音。惟日本當局對台灣原住民族，始終維持著殖民者與受殖者之間的關係，一種穩固的涇渭分明、絕對之階層差別，然而伊之助決心「以愛報仇」實踐聖經教訓的表現，這在殖民統治下文化衝突中顯露出人性光輝的一面，以及人文主義的啟蒙。

一八八二年九月二日，伊之助出生於日本四國高知縣幡多郡。早產的他，有點跛腳，體型也瘦小；十八歲赴東京，半工半讀完成學業；二十一歲，受洗成為基督徒。 一九○六年七月三十一日的「威里事件」（Wuili，在今秀林鄉佳民村）中，遭獵頭的日本人「井上彌之助」是其中一位，消息傳到日本時，其子二十四歲的伊之助，正好在參加一場基督教會舉辦的靈修會，他心中非常悲憤，激動地表示，一定要去台灣為父親「報仇」！

那天靈修會演講者的主題是「要愛你的仇敵」，伊之助想起了耶穌說的話：「兩隻麻雀固然用一個銅錢就買得到，但是你們的天父若不許可，一隻也不會掉在地上。」他猛然醒悟過來，認為父親的死，必定有上帝的旨意。

「你不可為惡所勝，反要以善勝惡」、「最好的報復方式，就是用愛勝過惡」。他終於明白聖經的教訓，並到台灣進行長達三十餘年「以愛報仇」的志業。

族人為實踐「傳統價值」與日本為確立「統治權」之爭，而引發了「威里事件」此一文明衝突中，一位日本青年聽到父親在台灣山地被獵去人頭，懷抱悲憤之心來報殺父之仇，卻在這片土地上，用醫療為原住民奉獻三十多年；他，是井上伊之助。

## 二、以人性實踐信仰價值

伊之助每次見到樟樹就想起父親，他心想若沒有樟樹，父親不會來台灣；他決心實踐聖經的教訓「以愛報仇」，到台灣原住民地區行醫傳福音。

當時總督府禁止在台灣的原住民部落傳教，但有限度准許行醫。井上伊之助為了能夠以信仰感化原住民，一九一○年一月前往靜岡縣伊豆戶田的寶血堂醫院研習醫學。

翌年十月，他購買了前往台灣的單程船票，以表達奉獻給台灣原住民的玉碎決斷。青山碧海、白雲浪花皆染初陽金色，伊之助坐在「信濃號」甲板上，看著

[16] 莊天賜撰文「太魯閣戰役的總頭目~哈鹿閣納威」取自 http://www.ntl.edu.tw/public/Attachment/4711954428.pdf

海鷗在輪船的上方飛行，蜿蜒而來的重重山水就是台灣，他讚美福爾摩沙的風景真是漂亮。船抵達基隆港，伊之助終於踏上台灣土地。十二月，他依日本蕃務總長的許可，來到樹杞林支廳轄管的原住民加拉排部落（今新竹縣尖石鄉嘉樂村），擔任醫療囑託。此區域屬於泰雅族傳統領域，各群在馬利哥灣溪、內灣溪、油羅溪沿岸或台地建立部落。當時第五任台灣總督佐久間左馬太，正為台灣山林的經濟利益進行「第二次理蕃計畫」，全力壓制泰雅族、太魯閣族的反抗，每天上演著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的紛爭──一方夾著國家主義的武力對部落展開侵占與殺戮，一方則以多數對抗少數的出草襲擊。「為了警戒，隔段時間就朝天開槍……原來附近前兩天才發生過原住民殺害事件」、「通高壓電的鐵絲網」、「據說某地四百名原住民正準備襲擊、有人說三十名已歸順的原住民逃到警戒區外……」伊之助的日記中，記錄了他當時眼中所見的震撼。他身為日本人，看到統治台灣的殖民地政府捨去教化、授產等撫育政策，以精銳的武器去殺害原住民，令他十分心痛；特別是「五年理蕃計畫」時，到處屍體橫陳，血流成河，伊之助更因此下定決心，終身要救治和教化台灣原住民。

在原住民部落行醫當中，時時都有原住民出草獵首的事情發生。他抱著殉死的決心進行醫療服務，甚至表示萬一遭到殺害時，要將遺骨埋在原住民部落，作為台灣土地的肥料。到台灣的第二年，伊之助將妻子小野千代子從日本接過來。千代子是一位賢慧且意志堅決的女性，在山上生活，不僅要面對物質的短缺、精神的枯躁，更要面對生命的挑戰。[17]

## 三、自稱是「不要命的大傻瓜」

初到山上不久，千代子因水土不服，患了腎臟病，經送住台北治療，才救回一命。後來，她懷第二胎時，山地衛生條件太差，官方勸她回日本待產，否則至少也要去台北的日本人醫院；但她以「原住民也沒有下山生子」為由，堅持在加拉排部落山上分娩，靠著自己剪斷臍帶才把嬰兒生下來。

原住民產婦在深山中臨盆，常有難產或死亡的情況發生，「不用下山，也能平安生產！」成了伊之助努力的目標。他不僅自己學得助產技術，更積極向上級建議，後來總督府也開辦了原住民婦女助產訓練班，為山地部落培育醫療人才。

自稱是「不要命的大傻瓜」，28 歲時，井上伊之助舉家遷移台灣，在原住民部落一待就是三十年，有三個孩子病死台灣。

## 四、人文主義是對抗殖民者的憑藉

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投降，在台日人開始被遣返。伊之助向台灣行政長官

[17] 鄧相揚 2006 年 5 月撰文「以愛報仇-行醫山地部落的井上伊之助」，載於【台灣慈善 400 年】。經典雜誌發行。

公署陳情，表明要留在台灣的意願，並取漢名為高天命。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爆發，伊之助一家人接到「歸國命令」；當他被迫離開台灣的消息一傳出，泰雅族原住民部落一片悲淒之聲。

「我沒帶什麼回來，除了三個孩子的骨灰。」原本打算歸化並埋骨台灣的伊之助，回到日本後，仍念念不忘台灣。「報紙如果有台灣的消息，我一字不漏地讀；吃飯時，如果收音機正好講到台灣，我便放下筷子；就算已經就寢，聽說有台灣的消息，也要起身打開收音機聽個仔細。每晚夢裏，我到海洋彼方的台灣……」

井上伊之助「以愛化解仇恨」的行誼，與太魯閣族「威里事件」歷史，息息相關；惟日本當局對台灣原住民族，始終維持著殖民者與受殖者之間的關係，一種穩固的涇渭分明、絕對之階層差別。因此人文主義是我們唯一的而且是最終極的抵抗憑藉。

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他以八十五歲高齡過世，安葬於埼玉縣入間市的墓園。

## 伍、威里事件對太魯閣戰役的影響

威里事件爆發，象徵日本當局對太魯閣人的招撫政策全然失敗，日方改採「先討伐後撫育」的方針，造成族人與日本人的緊張關係，一發不可收拾，該事件成為「太魯閣族對日戰爭」的導火線。討伐、壓迫方式包括設置隘勇線實施經濟封鎖、武力攻擊等。次年 5 月 31 日，日本當局完成威里隘勇線設置。隨後，徵調南清艦隊中的浪速、秋津洲兩軍艦，預計砲擊包括哈鹿閣納威在內，威里事件相關頭目的居住地。7 月 1 日，兩天的砲擊行動展開，哈鹿閣的擢其力社受害不輕，但並沒有屈服太魯閣人的反抗意志。其後，日本當局陸續構築巴都蘭、七腳川、鯉魚尾等隘勇線，逐漸將太魯閣族封鎖在山裡。1911 年，哈鹿閣納威曾率領 54 名社眾至威里隘勇線海岸分遣所要求交換物品，遭到拒絕。日人經濟封鎖策略達到初步成效。

1913 年起，日本當局著手計畫對太魯閣族的武力討伐工作。9 月，先探勘合歡山及能高山方面的形勢；10 月，再派遣由永田綱明警視、野呂寧技師率領的探險隊，勘查擢其力溪（今立霧溪）流域及愚屈地區。探險隊訛稱要測量開鑿道路的地形，騙取哈鹿閣納威於 10 月 16 日充當嚮導，當晚住在哈鹿閣的別宅；次日，探險隊行抵哈鹿閣本宅，將其地命名為哈鹿閣臺地。哈鹿閣臺地一帶展望甚佳，探險隊偷偷完成測量任務，當晚在哈鹿閣本宅住宿。此次探險，據野呂寧回憶：哈鹿閣並非不知探險隊來者不善，只是感到殺害隊員並無意義，也不願輕啟戰端，同時制止部分族人打算突襲探險隊的行動 1914 年，日本當局完成討伐準備工作，決定兵分東、西二路夾擊太魯閣族。東路討伐由警察負責，民政長官內田嘉吉任討伐軍指揮官，警視總長龜山理平太任副指揮官。東路軍又分為擢其

力方面討伐隊和巴都蘭方面討伐隊，前者由永田綱明任隊長，目標即對付由哈鹿閣納威所領導的外太魯閣群。

5 月 29 日，龜山副指揮官指派花蓮港廳長飯田章赴擢其力社，仍試圖勸誘外太魯閣群歸降。總頭目哈鹿閣納威拒不到場，僅由古魯社頭目比沙奧說明外太魯閣群不願與日本為敵，比沙奧並假稱願做討伐隊的嚮導，實則要引誘日軍至險要處加以伏擊，可惜此策略被其他原住民密報而失敗。

5 月 31 日，日方討伐行動展開，哈鹿閣納威率領 1 千名左右的外太魯閣群戰事據哈鹿閣臺地等天險強力抵抗，使日軍攻勢頻頻受阻。然日軍無論在人數或武器方面均佔有優勢，6 月 29 日，日軍已對外太魯閣各社形成包圍之勢。哈鹿閣眼見大勢已去，為避免部落和部眾受到毀滅性的傷害，乃在 7 月 3 日率領戰士向日軍繳械。8 月，討伐隊解散，20 世紀初東臺灣最大的戰役─太魯閣之役落幕。1915 年 2 月 22 日， 哈鹿閣納威抑鬱而終。[18]

## 陸、結語

「威里事件」開啟了日本對太魯閣族的武力鎮壓，改變了日本對台灣原住民的統治政策，從「討撫並用」的政策，轉變為「先討伐後撫育」的政策，更為往後最大規模的「太魯閣族對日戰役」埋下引線，因此威里事件是太魯閣戰役的導火線。對太魯閣族人而言，誠如太魯閣族耆老代表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在「太魯閣族抗日戰爭紀念系列活動」上的致詞內如下：

> 《太魯閣族與大自然的關係是建立在「互為主體」的基礎上，我們祖先說：「土地是血，山林是家」。「太魯閣族抗日戰役」是先人為捍衛民族尊嚴、守護土地，以生命對抗外來政權，留給我們這一代子孫一部淒美教誨的詩篇。
>
> 此一戰爭，雖已走過歷史隧道，至今仍被隱藏在幽暗的隧道中，只有讓這一幕血史，走出台灣史陰暗的角落，公平而忠實的記載在台灣史上，才能撫慰在彩虹另一端，走過風雲的太魯閣族先人英魂。1914 年 6 月，日本以大砲轟開了對太魯閣族人的統治大門，成功的強將其國家利益變成為族人所認可的唯一價值，族人經由此次對抗優勢族群的龐大人力、先進的戰備，戰爭失敗後，族人身、心、靈，從外爍的強悍抗日，轉為內在心靈的壓抑，日本透過「混居集團移住」的政策，徹底瓦解我傳統社會組織，成為現在理所當然的弱勢族群。我們的祖先，過去對自己的生存空間及傳統文化充滿信心，為了實踐 gaya，實現自我價值，鬥士們在太魯閣山區的英勇事跡，隨著先輩相繼辭世，加上外來政權殖民政策下，族人在茫然不知中，淪入集體性的歷史失憶症中。「太魯閣族抗日戰役」對族人有著有切膚之痛，因此要讓這一段信史，重見天日，讓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及子孫，能瞭解真相，並能緬

[18] 莊天賜「太魯閣戰役的總頭目-哈鹿閣納威」，載於【台灣人物誌】。

懷先人的遺風。此一戰役，對殖民者而言，只是一捲「空白的磁片」；而留給族人，卻是永遠在滴血、難以癒合的傷口。只有還原信史面貌，滴血才會停止，傷口才易癒合。祖先為了生活空間、保護家園及妻兒，奮不顧身稟然正氣的「義行」，是遺留給我們後代子孫，最佳的行誼典範，對族人而言，是永遠的尊榮和驕傲。此一壯志凌雲的「義行」對於後代子孫的啟示是，族人傳統的生活領域及自然主權，應該要以「名正言順」的態度，坦然向政府要求還我土地，讓族人在自己的土地上來「當家作主」。我謹代表族人向我先輩們，為捍衛民族尊嚴、守護土地，壯烈犧牲的精神，致上萬分的敬意。》[19]

台灣二十世紀初以來，太魯閣族人與日軍在太魯閣山區之戰爭，堪稱二十世紀台灣島上原住民最大規模的戰爭。此一戰役雖已走過歷史隧道，卻在種族中心主義的陰霾之中，仍未走出幽暗的隧道，只有讓這一幕又一幕的血史，走出台灣史陰暗的角落，公平而忠實的記載在台灣史上，才能撫慰在彩虹另一端，走過風雲的太魯閣族先人英魂。

歷史和民族是不可分的，正如舞者與舞曲不可分一樣。[20]俗世是一個歷史的世界，由人類所塑造，批判性思考不能屈服於國家權力，我們專注致力的目標不應該是人為製造的文明衝突，而是各個文化緩慢的共同運作，文化之間彼此重疊、相互因襲。[21]

莊坤良在「殖民、人道與歷史」一文中（2001）提出：

「文獻的書寫是掌握在主權者手中，被統治者只是統治者建構官方文本的素材。主權者的更迭易手，歷史的解釋權也隨著換手。所以歷史與文獻是由未來人們，於不同的時空情境裡，不斷書寫的過程。歷史沒有終點，只有不同的文獻解釋。因此歷史文獻的真相難明，只存於解釋與權力交雜的網絡之中。」

歷史是前人所創造的事實，我們現在也正在創造族人未來的歷史，族人的歷史解釋權應在我們手中，而不應成為當權者「文獻的存在」而已，任由他人詮釋。

[19] 2014 年 10 月 15 日太魯閣族耆老代表在「太魯閣族抗日戰爭紀念系列活動」上的致詞內容。
[20] 同註 11，頁 439。
[21] 同註 2，頁 15~16。

附錄：自由時報 2015 年 10 月 12 日 A12 自由共和國

# 原住民看反攻大陸

帖喇・尤道｜太魯閣族自治籌備會主委

依據美國學者戴蒙（Jared M. Diamond）在公元二〇〇〇年英國《自然》（Nature）雜誌二月份的一期中，一篇兩頁報導的短文標題是「台灣獻給世界的禮物（Taiwan's gift to the world）」。文中他根據一九八八年南島語言學家Blust（美國）以及Bellwood（澳洲）等人研究的結果：十個南島語亞系中，有九個集中在台灣。因此他進一步分析表示「台灣是南島語系的原鄉」。另外最近更由Y染色體、粒腺體DNA研究及最新的「細菌人類學」的分析結果，排序一目了然及解讀上乾淨俐落，有更進一步的證實，「台灣是南島民族的原鄉」的說法。

一六六三年鄭成功趕走荷蘭人之後，在台灣實行屯田政策，令數萬軍眷隨軍赴各地屯墾，打著「反攻大陸，反清復明」的旗子，他率領了相當多的大陸漢人遷台，由於福建人居多，其後代在台稱自己為「本省人」，台灣這塊「原民之地」很快形成了漢人居多的社會。

在一九四九年前後，因國共內戰後，國民政府帶來很多大陸的軍公教人員來台，基於安全上的考量實施戒嚴，打著「反攻大陸，統一中國」的旗子，也在台灣繁衍子孫。這是歷史發展的軌跡，應忠實地讓台灣島上各民族的真實樣貌擺放在歷史的天秤上，真心反省台灣史觀，還原台灣歷史的真相，才是這一代生活在台灣的人，留給我們下一代最佳的獻禮。

譚光鼎教授認為：漢民族應該會發現自己的祖先是怎樣用欺矇、驅趕、殺戮的方式，或蠶食鯨吞，或巧取豪奪地掠取原住民族的土地資源。筆者認為台灣漢人應對過去原住民族所受的「歷史創傷」，向原住民族公開道歉，給予法律上公平的對待與合理的補償，並進行制度變革，讓原住民族「自治」，恢復固有權，給予「尊嚴與平等」，以建構非殖民的政治及社會秩序。

當國內外著名學者都標榜，南島民族語是「台灣獻給世界的禮物」時，反觀目前台灣高中課綱微調，強調中華文化，忽視原住民族的聲音，就原住民族而言，台灣現行高中課綱，非「微調」問題，而是「結構性跳接式」問題，主事者應正視漢人分別於十七世紀末及廿世紀中期遷入台灣，都是打著「反攻大陸」的旗幟來台後，在台墾殖「移民」及對原住民族「殖民」的事實，也應誠懇面對台灣原住民族是屬南島民族的事實。

台灣是我們原住民族的祖居地，原生活、奔馳於台灣島周邊平地，從未有過「反攻大陸」的念頭，漢人來台前我們祖先就在這裡生活已經一萬年以上，原住民只想在這個美麗的島上，有尊嚴與平等地生活，大家抱著同舟共濟的心，不論先後「相聚自是有緣」的心念，不分族群都團結在台灣這個大家族的旗幟，讓我們下一代生活在非「二元對立」，而是多元色彩的土地上。